

汉语语言学
世纪丛书

郑定欧 著

词汇语法理论
与
汉语句法研究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汉语语言学世纪丛书

词汇语法理论
与
汉语句法研究

郑定欧 著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05369.17
(京)新登字 15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词汇语法理论与汉语句法研究/郑定欧著.

-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9 印

(汉语语言学世纪丛书)

ISBN 7-5619-0674-9

I. 词…

II. 郑…

III. 汉语-语法-研究

IV. H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2797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1998-2394 号

责任印制: 乔学军

出版发行: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83)

印刷: 北京北林印刷厂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9.125 插表: 2

字数: 230 千字 印数: 0001-3 000

书号: ISBN 7-5619-0674-9/H·9838

定价: 19.00 元

**LEXICON-GRAMMAR
AND
CHINESE SYNTAX**

**LEXIQUE-GRAMMAR
ET
SYNTAXE CHINOISE**

T A CHE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汉语语言学世纪丛书

序

赵金铭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王建勤先生向海内外语言学界名家约稿，得佳作八部，拟编为汉语语言学丛书。我忝列出版界两载有余，得与建勤朝夕切磋。丛书编成，我们不约而同一致认为应以世纪命名，良有以也。

今年是 1998 年，一百年前，我国语法学的开山之作《马氏文通》诞生，这是我国语法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作者马建忠先生以富国强兵、开启民智为务，首创中国语法学，对后世语法学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不朽之作影响日深日广，今年正好一百年。一个世纪以来，在中国传统语言学领域里，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在前辈学者辉煌成就的基础上，溶进了现代语言学理论意识和研究方法，正是前修未密，后出转精。语言学的其他门类都有所发展，而尤以汉语语法学为最突出。从初期借鉴西方传统语法体系，到四十年代开始借鉴西方语法理论，到六十年代前后借鉴描写语法学和转换生成语法学，直到本世纪后三十年，汉语语法研究渐入成熟期，国外各种语法理论开始不断影响汉语语法研究，在注重语言形式研究的同时，更加关注社会、文化环境中的语言，开始注重于功能分析，于是，呈现了一种多元化的倾向。一个世纪汉语语言学走过的路，应该加以总结。如果以 2000 年的第一天为进入 21 世纪，距今只剩下一年多时间，展望 21 世纪，中国汉语语言学研究如何迎接 21 世

纪,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进入 21 世纪,又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总之,一百年前,《文通》诞生,中国现代汉语语言学肇始,至今一个世纪。一个世纪汉语语言学的发展虽不无曲折,但成绩斐然,实应总结。瞻望下一个世纪,随着世界学术交流的开展,汉语语言学的发展必定前景广阔,十分看好。此三端实丛书以“世纪”命名之初衷。

丛书中收有两部分语言学家的著述,其中境内学者如刘坚、邢福义、马庆株、陈恩泉,他们学术基础扎实深厚,对语言事实观察细密,描写精微,分析入木,秉承一代宗师吕叔湘先生一贯倡导的“强调广搜事例,归纳条理,反对摭拾新奇,游谈无根”,治学严谨。近二十年来,他们在事实描写的基础上,从汉语语言学角度开始对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思考和总结,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另一部分是长期在国外工作或目前在中国大陆之外工作的学者,如王士元、徐烈炯、郑定欧、刘勋宁,他们或接受过西方当代语言学的系统训练,或较多地接触西方当代语言学的最新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并运用到汉语语言学研究之中,从而从别一个角度揭示了汉语的某些特点和规律。这两部分人的研究都深深地植根于汉语,各有所长,各具特色。丛书作者之一徐烈炯有言:“由于理论框架、治学目标和工作语言的差异,国内学者常常难以了解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的理论观点。而国外学者却常常未能充分掌握国内学者收集的丰富语料。”本丛书的出版正在于沟通双方,促进相互交流与了解,使汉语语言学得到更加充分、更加深入的发展,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充实语言学理论,为世界语言学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在确定汉语语言学世纪丛书选题时,必先对我国当今语言学研究的总态势,把握准确。本丛书作者之一刘坚在《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一书中曾经指出:“语言学研究的总态势是:现代国外语言学研究的方法不断被引进到我国语言学各个研究领域;语言学各个领域都在努力探索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如何与我国语言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在‘结合’的过程中,就一些局部领域开始

向创新的方向发展；同时，各个领域在不同程度上都注意到了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结合，这在中文信息处理技术、汉语文和少数民族语文教育有关各个方面最为突出。”

总态势呈两种潮流，一种是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在这方面本丛书有如下三部著作：《人与文——忆几位师友论若干语言问题》（刘坚）特别注重虚词研究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尤其关注在近代汉语时期发展极为活跃的助词系统，通过研究展现了近代汉语语法面貌之一斑，从而总结出了一些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如汉语虚词一般都是从实词经过语法化过程发展变化而来的。《语言的探索·学路历程——王士元语言学论文选译》研究视野广阔，打通语言学学科与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首创“词汇扩散理论”，在世界上引起反响，提出了不少其他理论难以提出的问题。《共性与个性——汉语语言学中的争议》（徐烈炯主编）挑选了十二个十多年来语言学界最为关注的、讨论得最多的题目，写出综述和评论，包括：该题目的理论价值；国内外出版的有关文献；对文献中重要理论和观点所做的评论。

另一潮流是试图探讨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与我国语言实际相结合问题，在这方面本丛书有以下五部著作：《汉语法特点面面观》（邢福义主编）围绕着汉语句法与汉语特点，或对语言事实进行深入发掘，或从理论上阐述一己之见，反映出语法学者目前在理论上和方法上的苦心追求与探索。正如邢福义先生所说：“正在多元化地、多触角地开展着汉语语言学研究，以新的姿态面对着更新的未来。”《汉语语义语法范畴问题》（马庆株）从汉语语法特点出发，提出与印欧语的形态学语法相对而言的汉语语义语法，从而为摆脱语法研究中的“印欧语的眼光”，开创一条独具特色的汉语语法研究的新思路，做了有益的尝试。《词汇语法理论与汉语句法研究》（郑定欧）顺应当代语言学的词汇主义潮流，从词汇语法的核心原则，即“语法规则必须通过词汇的实证检验才能成立”出发，试图以汉语的若干句式作为研究的突破口，为汉语语法研究寻求了一块新的领域。由陈恩泉先生倡

议发起并组织召开的五届双语双方言研讨会,在我国语言学界独树一帜,《双语双方言与现代中国》(陈恩泉主编)使用社会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从单方言静态描写的方法中脱颖而出,形成了我国双语双方言动态比较的方法,从而形成了我国双语双方言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现代汉语研究》(刘勋宁)把现代汉语的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熔为一炉。作者浸淫在自己的方言之中,一点一滴地去体味,挖掘出不少值得重视的语言事实。由于多了一个方言参照点,有些问题就更容易看清、说清。

汉语语言学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所憾者至今尚未融入世界语言学的主流。于是,我们不得不反思,差距在哪里?汉语本身是一份丰饶的资源,汉语学者在开掘这份资源的同时,一直在努力寻求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创新之路在于,实现西方语言学与汉语语言学相结合,也就是吸收西方语言理论的精髓,从汉语语言现象的研究中升华出普遍规律和理论原则,提炼出相应的研究方法。本丛书的作者正在做这样的探索,当然,路漫漫其修远兮,探索正未有穷期。着眼于21世纪,我国要大力提高全民的文化科学素质。时代不仅要求汉语语言学为语文应用、现代科技服务,还要求语言学者必须尽快地探索最新的理论,使用最有成效的方法,研究汉语语言材料,使汉语语言学获得新的发展,进入世界语言学研究的前列。

本丛书作者有前辈语言学家王士元、刘坚、邢福义、陈恩泉,他们在语言学界声誉卓著;也有同侪语言学家徐烈炯、马庆株、郑定欧、刘勋宁,他们也是英才卓萃。八位先生的大著合为丛书,异彩纷呈。我因参与其事,故略述编纂宗旨,并做概要介绍,是为序。

1998.5

目 录

第一部分(01-36) 理论基础	(1)
·理论的应用化	
·实证主义与理性主义	
·语义和句法的互动	
·面对汉语的实际	
第二部分(37-70) 词汇语法的操作原理	(30)
·操作理据	
·操作背景	
·操作意图	
·操作方法	
第三部分(71-131) 实例分析:把字句	(62)
·研究的价值	
·研究的现状	
·共现条件:分布	
·共存关系:变换	
第四部分(132-136) 余论	(123)
注释	(127)
附录	
附录(一) 作者相关论著	(137)
附录(二) 格罗斯教授专稿:词汇语法概述	(164)
附录(三) 惯用语矩阵	(179)
附录(四) 文献目录	(193)
附录(五) 补充目录	(277)

第一部分(1-36) 理论基础

01 本书的目的在于:(1)使人明白词汇语法的方法是怎么个方法;(2)如何把词汇语法应用在汉语研究之上。目标则是有序地构建现代汉语普遍描写语法。所谓“普遍”指的是力求涵盖主要方言的重要事实。所谓“描写”,指的是力求把句子的成句条件及变换条件说得更清楚一些。

02 语言学的属性是什么?语言学既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但它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又都密不可分。我们必须理性地认识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二分法并不能合理地给语言学分类。我们只能说,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如对于语言符号的物理结构)或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如对于社会功能)来研究语言学。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的时候需要避免只看到自然属性这一局部现象就把语言学也看成是自然科学,因为不管这些属性多么重要,也不能忽略语言学同时具有社会属性的一面。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的时候,也不能把语言的社会性不适当地夸大,以为功能主义可以“代替”结构主义。我们注意到功能主义的取向和价值,但仅仅视之为语言研究一个辅助性的工具。企求语言的使用功能能为语言结构作出最终的解释是一种绝对化的观点。明白了语言学二重属性的特点,我们可以把语言定义为一种特殊的、带有自然现象许多特点的社会现象。另外,我们必须指出,语言的属性和语言研究的方法不可混为一谈。乔姆斯基在《语言与心理》一书中认为语言是一种观念的、存在于物质实体之外的东西。^①

对于这种心智主义的语言观,王宗炎(1982)中肯地作了评论。^②问题是,由此而断定“语言学家所能做的便是假设出一套理论(或模式)来模拟语言中枢的内容(……)”^③,我们则不敢苟同了。有人说,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有人说,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有人说,语言是一种心理现象。都对。但语言只能,也只应该从语言的内在结构去研究,即把语言作为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来研究,把一切“非语言”因素(如社会因素、文化因素、心理因素)严格地控制在一个我们把握得了的、比较狭窄的范围之内。明确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样大家才有共同语言,才能营造一个属于语言学的独立空间,使其在健康有序的轨道上前行。

“属于语言学的独特空间”包含着两层意思。一,语言学探讨的是经验范围内的有关事实,即有关语言结构内部或外部的解释,目的在于向应用研究人员提供一个易操作、能运用的系统。二,对语言结构的内部解释属学科的本位研究,而对其外部的解释属学科的主体研究。我们对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必须有一个正确认识和把握,以避免理论研究及体系构建上的失衡,甚至造成喧宾夺主的局面。

03 20世纪语言学最突出的特点为结构主义方法论。西方的语言学学派按照自己的传统及研究背景分别丰富和发展这个方法论。各派的理论和方法不完全一样,但是他们都具有以下某些共同点:

- (1) 把语言看成是一个结构系统;
- (2) 注重语言结构中各个成分之间的关系;
- (3) 重视共时的研究;
- (4) 注意语言的特征,强调形式的分析和描写。

应当指出,早期的结构主义者在音位学和形态学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句法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可以说是沦为“穷亲戚”了。50年代以来,句法学在现代语言学研究终于取得了先导地位。这实有赖于乔姆斯基早期的生成语法以及哈里斯一贯倡导的变换语

法。它们各自的演变史以及彼此之间的竞争史容后再述,不过,语言学的目的既然是探求语言结构内部的规律性原则,语言学家的任务就需要明确地定位。我们的看法是:

- (1) 语言学家的任务是描写语言。
- (2) 语言学家描写语言事实都是整体性的,不论描写哪一类型的语言事实都具有同等的价值。
- (3) 语言学家描写语言的手段跟他所要描写的语言事实的类型和性质有着很大的制约关系。这就是手段的局限性。无论是形式主义或功能主义都有很大的局限性。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各自遵循本身的逻辑或规律进行独立研究。
- (4) 句法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句法研究应该包括分类的研究观点,转换的研究观点,功能的研究观点,才能帮助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而持续发展。所以,所谓“语言学不是分类,而是衍生”的看法是片面的。

04 西班牙两位学者在采访了八位代表着方法论上不同取向的法国语言学家之后于1992年出版了名为《语言学何去何从》的书。当中提出一些关于“理论”的观点,值得我们思考。节录如下。^④

在任何的学科中,所谓“理论”指的是(1)它由形成一个整体的、相互连贯的假设所组成;(2)包括在其中的假设可被验证。要达致上述两个条件,需要满足两个理论构建的条件:一是描写性理论条件,一是解释性理论条件。前者回答“为什么”,后者回答“怎么样”,代表语言研究的不同的、互为补充的取向。对于“为什么”的回答,代表着心理主义语言观,致力于探求语言现象的所然,具有解释性性质。对于“怎么样”的回答,代表着实证主义语言观,致力于探求语言现象的已然,具有描写性性质。

大家一致认为描写取向十分重要,尤其是在现今的欧洲,描写取向往往受到严重的忽视。大家同时也一致认为,只有在对

语言现象进行精细和穷尽描写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就某些语言现象提出形式化解释。(……)相反的做法,即离开先前的描写功夫而进行形式化只会导致空洞的说理。

描写,即构建。(……)而构建意味着“差异”的把握。

描写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有助于发现新问题的推断方法,是检验理论并确认其真实性的方法”。

05 上面的文字引发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叫作科学精神?

科学一般包含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科学的外在可见的形式。就计算机语言学来说,可以指电子词典。第二个层次是科学的研究方法,旨在建立第一个层次的科学。可是,要推动科学向前发展,首先需要的是科学精神。所谓科学精神,第一,是创新意识。语言学家必须勇于和善于探索前人未解决的问题,表现出要比前人有所进步的心理倾向。第二,是实证态度。一切假说都必须通过实证的检验。第三,怀疑精神,现实世界中的问题,都没有贴上标签。语言学家决不可不经过分析批判就盲目地接受任何东西,从“学派”到“规则”皆如此。语言学家相信一切语言理论和方法都受到语言事实的检验,而不相信语言学中有什么宗教信条那样的东西。当然科学的怀疑是一种有组织的怀疑,受科学共同体的约束,而不是出于个人纯粹主观的猜测。我们认为造成目前语言学研究困境的根本原因首先在于缺少自然科学研究中所表现出的那种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

06 引发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客观地评估人们对语言的认识程度?我们认为,语言学本身仍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成为精密的科学。这就是说,就目前人们对语言的认识程度来说,语言学仍然停留在一个科学研究领域,即尚未充分地具有诸如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的理论地位。离开回答语言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而不会或不能是那个样子还有相当的距离;况且连语言是什么样子还搞不清楚。这样

无比丰富、复杂的语言不是一些抽象的共性模式所能概括得了的。换句话说,造成目前语言学界的困惑的重要原因首先在于对语言科学的理论期望不适当地过高。这种困惑只能通过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才得以消解。

07 引发的第三个问题是,究竟什么是科学方法?《光明日报》最近有一篇名为《当今社会科学发展四大趋势》的文章,写得很好,摘其要而录如下。^⑤

一、从各学科的界限分明到各学科间的综合与融汇其要。学者们日益认识到,各学科间的分工具有相当大的人为性,并不反映“社会现实本身”。基于这种认识,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势之一,便表现为超越学科间的硬性壁垒而走向综合和融汇,强调各学科的对话、合作与互补。

二、从追求普遍性理想到设定本土化目标。长期以来,社会科学以自然科学为模型,以探求社会普遍法则为己任。但自本世纪70年代以来,这种普遍主义理想遭到质疑,取而代之的是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目标。它强烈反对盲目崇拜西方理论,反对削足适履地把各民族的生活经验强塞入西方社会科学的逻辑图式中,强调社会科学研究与各民族的社会历史特点相结合。

三、从与自然科学的硬性区分走向二者的内在渗透与互动。当代人类的许多重大问题,如生态、人口、经济规划等,呼唤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通力结合。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许多以往截然对立的观念正变得相容与趋同。

四、从形式化、学院化的追求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由于过度量化与形式化,社会科学变得远离其本应扎根于其中的现实生活世界。经过反省,学者们明确意识到,只有立足于现实生活世界,社会科学才能获得其最本源的意义源泉与现实力量。社会科学这一面向现实生活世界的发展趋势,标志着它真正走向成熟。

08 上文的中心思想是理论的应用化问题。语言学特殊属性决定了方法的选择必须以应用为先导。生成语法讲求理论的自我完善,只要能自圆其说,可以不考虑或少考虑实用价值。其结果,一方面是后续理论蜂出,而这种种理论大都以假设为前提,以所谓“模型化”为归宿。开口闭口模型化,大有非模型化不足以言科学之势。更有甚者,对于本来简单明了的语言事实,非要随意捏造几个与语言不相关的、或称数学或称心理学的公式,摆在那里,吓唬读者。另一方面,导致了语言科学长期偏重理论探讨,既对盲目追求模型化的负面价值缺乏必要的警惕和制约,同时又严重地忽视应用研究。在旧有的语言科学价值观念的影响下,语言科学工作者往往热衷于从理论到理论的逻辑论证,认为语言科学研究成果的理论性越强,逻辑论证越严密,抽象思维越深奥,它的价值似乎也就越大,层次也就越高,而研究者的水平也就越能得到充分的显示和肯定。相反,着眼于现实问题的应用性研究,其研究价值乃至研究者的水平都难以得到应有的评价。这种旧观念严重阻碍着语言科学的应用性研究。有人引用英国哲学家培根(Bacon)的名言“知识本身并没有告诉人们怎样运用它,运用的智慧乃在书本之外”来试图说明理论探讨和应用探讨可以互不相干。我们认为这是不合适的套用。哲学跟语言学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学科,彼此的人文生态环境,即学术上的需要或社会上的需要是不同的。哲学高层次的思辨跟语言学抽象模式的最大差别在于哲学可以管全社会,但语言学必须落实到具体的、社会用得着的学科,如心智主义可以落实到神经科学,描写主义可以落实到计算机科学一样。

09 旧有的语言科学价值观念的确引发了不少糊涂的说法,如“(汉语语言学)吃尽‘重材料、轻理论’的苦头”;“归纳是低层次、解释是高层次”;“就现代科学而言,仅仅记录现象,把材料分类等不能算科学

研究”，等等。这种种糊涂说法源自研究者本身对什么是科学方法这一根本性问题所带有的错误的或狭隘的观念。吕叔湘先生早就告诫我们：“搞理论不会有好的结果。大家觉得搞理论容易，搞具体问题难。但是，我说看错了。搞理论问题是表面上容易着手，事实上很难有结果。你没有那个基础呀，没有具体问题研究的基础，你搞理论搞不出个结果来。”^⑥

10 语言科学方法上的选择必须以应用价值为先导。在这个大前提下，首先需要提出的是方法上的淘汰与创新。自然科学包括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作为科学认识的模式和准则，它是人类科学实践的产物。因此，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方法都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科学理论的发展，通过不断地淘汰与创新从而逐步得以充实、优化和发展。方法上的淘汰与创新是科学方法进化的主要形式，在科学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已为科学发展的历史所一再证实。

既然方法上的淘汰在科学发展中具有极重要的意义，那么，在科学探索中方法上的淘汰应注意哪些问题？换句话说，怎样进行方法上的淘汰才能达到深化科学认识，推动科学发展的目的呢？下面我们试就方法上的淘汰建立一些基本原则。

首先，方法上的淘汰必须遵循目的性原则，即根据研究的目的来淘汰旧方法，选用新方法。这是因为科学方法从本质上讲就是人们达到某种目的的途径或手段，这就必然要求语言工作者在探索事实的过程中适时淘汰掉难以达到研究目的的旧方法，寻找、创造和选择能达到认识目的的新途径或新手段。目的性原则是进行方法上的淘汰首先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

其次，方法上的淘汰要遵循简捷有效性原则，即在科学探索中要以解决科研课题是否简便、有效和快捷为尺度来进行方法上的淘汰，在方法上对传统方法保留其有效部分，剔除无效部分。科学研究是

一种探索未知自然规律的认识活动,随着认识实践的不断深入,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加深,科学工作者所要解决的课题复杂性、难度也越来越大。一些过去相当奏效的研究方法在新的课题面前显得十分笨拙,难以得心应手,更有甚者则对新问题的解决一筹莫展,费尽心机依然成效甚微,失去了方法上运用的价值。

第三,尝试性原则。方法上的淘汰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到各种因素。因此方法上的淘汰不能贸然进行,必须先以现有各种方法进行尝试性研究,并根据尝试结果来比较现有各种方法的优劣,然后再从中汰劣择优,从而筛选出最优化的研究途径和手段。最优化的研究途径和手段体现在有用理论、暂定理论和更佳理论之上。某种理论只要能帮助和指导更深的理解(或叫理论)和实际活动,就是有用的。然而,理论应通常看作暂时的,因为精神努力可产生某个新的理论或修正理论,对相关事实的了解更加深入,也因为我们对相关事实的了解可能要变化,对新或旧事实相关性了解可能会变化。每一种情况都说明,该理论现在应与不同的东西相吻合,吻合的程度即理论的优劣,应重新对其进行评估。因此,每个理论不仅应促使我们发展与我们的感觉更相配的更好理论,而且使我们对相关事实的理解向精度和广度发展。即使是最具吸引力的理论也应看作暂时的。

11 让我们以本世纪语言学实证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竞争史来说明上面的论述。美国耶鲁大学的语言学家 R. Wells 曾经有过这样的评论:结构语言学派是美国语言学活动中的一个重要过程。它的全盛时代是 1933 年至 1957 年,大致说来自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一书出版后起至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理论》出版时止。站在 1957 年乔姆斯基的立场来说,即句法的抽象结构是语言的基础,以布龙菲尔德学派为代表的美国结构主义传统确实受到很大的震撼;仅仅局限于分析、整理音素和词素的实证活动受到很大的冲击。道理很简单:语言的音素系统及形态系统基本上属于封闭性的有限系统;不管它们